

旅游资源、工业集聚与资源诅咒

朱希伟 曾道智*

内容提要 本文通过建立两国三部门三要素模型,探讨了大国开放经济背景下旅游服务业扩张对工业发展的影响及其福利含义。研究发现,旅游服务业发展会带来收入效应和转移效应,收入效应对工业发展具有正向促进作用,而资源转移效应对工业发展具有负向挤出效应。因此,旅游服务业发展究竟是促工业化还是去工业化与外生参数有关。当工业品贸易成本足够低和居民对本国旅游服务品偏好足够强时,大国拥有丰裕的旅游资源带来的收入效应会超过资源转移效应,从而吸引资本从小国流向大国,使均衡状态时大国的工业企业比例超过其初始资本比例,最终逃脱/资源诅咒陷阱。如果两国居民都消费本国和国外的旅游服务品,那么随着人们对旅游服务品支出比例的提高,小国居民的相对福利水平会不断提高,以至于超过大国居民的福利水平。

关键词 旅游资源 工业集聚 资源诅咒

一 引言

改革开放 30 年来,中国旅游业取得了飞速发展。入境过夜旅游者人数从 1980 年的 350 00 万增加到 2006 年的 4991.34 万,世界排名从第 18 位升至第 4 位;国际旅游外汇收入从 1980 年的 6.17 亿美元增加到 2006 年的 339.49 亿美元,世界排名从第 34 位升至第 5 位(国家旅游局, 2007)。据联合国世界旅游组织预测,到 2015 年中国将成为世界第一大入境旅游接待国和第四大出境旅游客源国,成为世界第一大旅游市场。但是,对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而言,工业部门仍然是推动一国经济发展的重要部门。一旦工业被其他部门的扩张所挤出,该国想恢复工业的发展往往是很困难的。20 世纪 60 年代,已是制成品主要出口国的荷兰因发现大量天然气,结果导致 70 年代的荷兰遭受了通货膨胀上升、制成品出口下降、收入增长率降低、失业率增加的困扰,被经济学家称为“荷兰病”(Corden and Neary 1982)。Geb(1988)进

* 朱希伟:浙江大学经济学院 浙江大学民营经济研究中心 杭州市浙大路 38 号 310027 电子邮箱: xwzhu@zju.edu.cn; 曾道智:日本东北大学大学院情报科学研究科 日本宫城县仙台市青叶区荒卷字青叶 6-3-09 〒980-8579 电子信箱: zeng@seis.hokue.ac.jp

作者感谢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转型背景下产业集聚与区域协调发展的理论与经验研究 0(项目批准号: 08JJD790155)、日本文部省研究(基盘研究 C1853017920 和 A19203013)以及浙江大学/985 工程 0 二期项目(浙江大学民营经济研究中心 CRPE 合作研究)的资助。

作者感谢两位审稿人提出的宝贵建议,他们的建议对论文的修改大有帮助。作者还感谢崔凡、藤田昌久(Masahisa Fujita)、何鸣、彼得斯(Dominique Peeters)、蒂斯(Jacques-Francois Thisse)以及在比利时鲁汶大学运筹学与计量经济学研究中心(CORE)和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举办的研讨会上的参与者给予的有益评论。当然,文责自负。

一步针对/荷兰病 0现象提出/资源诅咒 0命题,即自然资源丰裕的国家其经济增长反而缓慢。

事实上,旅游资源在很大程度上也属于自然资源。¹不可否认,旅游资源与煤炭、天然气、石油等自然资源还是存在一定的差别。煤炭、天然气、石油等自然资源的开采虽然要在资源储藏地进行,但其进一步的加工处理以及制成品的消费可以在异地进行,仍然具有可贸易品特征。旅游资源则不同,其物理存在地与消费地往往是相同的,即居民必须从其居住地来到旅游资源所在地才能进行旅游资源的消费。由于地文景观、水域风光、生物景观、天象与气候景观等具有不可移动和非贸易品特征的旅游资源的丰裕程度往往只取决于存在地的自然条件,与人类社会的活动关系不大,我们认为在很大意义上可以将其视为一种特殊的自然资源加以研究。我们关心的是,旅游资源是否存在经典文献讨论的煤炭、石油、天然气等自然资源的/资源诅咒 0命题。也就是说,旅游业发展是促工业化 (pro- industrialization)还是去工业化 (de- industrialization)。从已有研究来看, Copeland(1991)、Nowak等(2003)、Hazari等(2003)、Chao等(2006)及 Nowak和 Sah li(2007)运用非贸易品模型在小国开放经济框架内证明了旅游业的扩张对经济带来负面影响。这样的处理对于研究中国这样的大国来说,显然是不合适的;同时,小国开放经济条件下的一般均衡模型,由于假设小国贸易品部门的产品价格由世界市场决定,难免有所缺憾。更为重要的是,已有的经验研究发现旅游部门扩张对经济的影响是不确定的。一方面, Balaguer与 Cantavella- Jorda(2002)、Dritsak is(2004)、Durbarry(2004)和 Kin等(2006)的研究发现,旅游部门在西班牙、希腊、毛里求斯和中国台湾等经济体的长期经济增长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另一方面, Oh(2005)也发现旅游部门在韩国的扩张并没有带来经济的增长。因此,我们需要建立大国开放经济的一般均衡模型,在所有商品和要素价格内生的条件下,从理论上回答旅游服务业发展究竟是促工业化 (pro- industrialization)还是去工业化 (de- industrialization)这一问题。

本文以下部分的安排为:第二节建立大国开放经济的三要素三部门模型来刻画引入旅游资源的两国开放经济;第三节是模型的均衡和稳定性分析;第四节是福利分析,最后是本文的结论。

二 基本模型

考察一个由南北两个国家构成的经济系统,有三种生产要素:劳动力、资本和旅游资源。劳动力在两国间不流动,但可以在一国的不同部门间自由流动;资本在国际间和部门间自由流动。旅游资源是一种不可移动的生产要素,将其作为投入生产的旅游服务品也是不可移动的消费品。整个经济的人口、资本和旅游资源总量分别为 L^w 、 K^w 和 S^w ,每个居民拥有 1 单位的同质劳动力。北方人口和资本占整个经济的人口和资本总量的比例均为 $(1 - \theta)$,北方旅游资源占整个经济的旅游资源总量的比例为 θ 。每个国家所有要素归该国居民平均占有,从而居民平均分享该国的劳动力收入、资本收入和旅游资源收入。不失一般性,我们假设 $\theta > 1/2$,即从资本和劳动力存量来看,北方是一个大国。同时,如果 $E = (L^w, K^w, S^w)$,两国之间不存在赫克歇尔 - 俄林(H - O)意义上的要素禀赋比较优势。假设在经济系统实现竞争均衡时,北方雇用的资本占整个经济资本总量的比例为 h 南方雇用的资本占整个经济资本总量的比例为 $1 - h$ 根据新经济地理学的简化假设,均衡状态时每个国家雇用的资本均有 θ 份来自北方, $1 - \theta$ 份来自

¹ 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于 2003 年发布的 5 旅游资源分类、调查与评价 6 (GB/T18972- 2003)将旅游资源定义为,自然界和人类社会凡能对旅游者产生吸引力,可以为旅游业开发利用,并可产生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的各种事物和因素。依据旅游资源的性状,即现存状况、形态、特性、特征划分,分为地文景观、水域风光、生物景观、天象与气候景观、遗址遗迹、建筑与设施、旅游商品、人文活动等 8 个主类。

南方,且与 H 的大小无关 (Baldwin et al, 2003)。这样处理的目的是使两国平均的资本收益率相等,从而资本的国际流动实现均衡。

南北两国都存在三个生产部门:农业、工业和旅游服务业;农业和工业属于贸易品部门,旅游服务业属于非贸易品部门。农业部门生产农产品 (A),其生产活动使用劳动力作为单一投入且规模报酬不变,即 1 单位劳动力生产 1 单位农产品。工业部门生产多样化的工业品 (M),每个种类的工业品生产需要使用 1 单位资本作为固定投入和每单位产出需要 Q ($Q > 1$) 单位劳动力作为边际投入;故第 i 种工业品生产的成本函数为: $TC(m(i)) = r + Qm(i)$, 其中, $m(i)$ 为第 i 种工业品的产量, r 为资本收益率, w 为工资率。旅游服务部门生产旅游服务品 (T),其生产技术用劳动力和旅游资源作为投入的里昂惕夫函数来刻画,即 $T = \min\{aL, S\}$, 其中, $a > 0$ 为常数, T 为旅游服务品的产量, L 为劳动力投入数量, S 为旅游资源投入数量;其成本函数为 $TC(T) = (aw + s)T$, 其中, w 为工资率, s 为旅游资源的价格。从市场结构来看,农产品和旅游服务品市场是完全竞争的,工业品市场则是垄断竞争的 (Dixit and Stiglitz 1977)。从贸易成本来看,假设农产品贸易成本为零,从而规模报酬不变的生产技术和零贸易成本使得农产品和劳动力在模型分析中充当计价物,即 $p_A = p_A^* = w = w^* = 1$; 其中, p_A 和 p_A^* 分别为农产品在北方和南方的价格, w 和 w^* 分别为北方和南方的工资率。工业品的贸易成本采用萨缪尔逊的“冰山型” (Samuelson's iceberg form), 即 $S > 1$ 单位工业品由发送地运出,只有 1 单位运达目的地 (Samuelson, 1952)。旅游服务品由于具有不可移动性,故其贸易成本等于无穷大。为使模型的分析有意义,假设整个经济的劳动力总量 L^w 足够大,从而确保每个国家在满足工业和旅游服务业生产活动对劳动力需求的前提下,仍有一定数量的劳动力从事农业生产。南方和北方代表性居民的偏好分别由如下效用函数给出:

$$U = [T^C (T^*)^{1-C}]^{1-N} M^{L(1-N)} A^{(1-L)(1-N)}, U^* = [T^{1-C} (T^*)^C]^{1-N} (M^*)^{L(1-N)} A^{(1-L)(1-N)} \quad (1)$$

其中, $L, N \in (0, 1)$, $C \in [0, 1]$; M, M^* 分别表示北方和南方居民消费的工业品组合, 即:

$$M = \left[\sum_{i=1}^n \bar{m}(i)^{\frac{R-1}{R}} di + \sum_{i=1}^{n^*} \bar{m}^*(i)^{\frac{R-1}{R}} di^* \right]^{R/(R-1)}, M^* = \left[\sum_{i=1}^n \bar{m}(i)^{\frac{R-1}{R}} di + \sum_{i=1}^{n^*} \bar{m}^*(i)^{\frac{R-1}{R}} di^* \right]^{\frac{R}{R-1}} \quad (2)$$

其中, $R > 1$ 为任意两种工业品之间的替代弹性。同时,为简化分析,我们对模型中变量的单位进行巧妙处理,即设定工业品生产的技术参数 Q 与居民的偏好参数 R 之间满足关系式 $Q = (R-1)/R$ ($Q > 1$)。根据文献传统的约定, (1) 南方的变量以上标 $*$ 以示区别,如 n 代表北方生产的工业品种类数, n^* 代表南方生产的工业品种类数; (2) 相对于本国变量,外国变量以下标 $*$ 表示区别,如 $\bar{m}(i)$ 代表北方居民对南方生产的第 i 种工业品的消费量, $\bar{m}^*(i)$ 代表南方居民对北方生产的第 i 种工业品的消费量。为了使均衡状态时南北居民对旅游服务品的消费为正,我们假设居民用于购买旅游服务品的支出份额 N 充分大;也就是说,旅游服务品对每个居民来说不仅是生活所必需的,而且是很重要的。若 $C = 1$, 表明两国居民只消费本国的旅游服务品,不消费外国的旅游服务品;若 $C = 0$ 表明两国居民只消费外国的旅游服务品,不消费本国的旅游服务品;若 $C \in (0, 1)$, 则表明两国居民都消费本国和外国的旅游服务品。为简化分析,假设居民消费本国和外国生产的旅游服务品不需支付旅行成本。¹ 由居民效用最大化问题可知,北方生产的代表性工业品在北方和南方面临的需求函数分别为:

$$d = L(1-N)p^{-R}P^{R-1}E, \quad \bar{d} = L(1-N)(\bar{p}^*)^{-R}(P^*)^{R-1}E^* \quad (3)$$

其中, E, E^* 分别代表北方和南方的消费总支出; p, \bar{p}^* 分别代表北方生产的代表性工业品在北方和南

¹ 我们发现,如果将居民消费别国的旅游服务品需要支付的一次性旅行成本以如下两种形式引入本模型,不会改变基本结论。其一,每个居民都必须花费 C 单位时间/走路过去,从而其工作时间变为 $1-C$ 单位;其二,每个居民都/骑马过去,从而必须购买 C 单位农产品来饲养马匹。

方的销售价格。同时,北方和南方居民消费工业品组合的价格指数 P 、 P^* 分别为:

$$P = [\sum_{i=1}^n \bar{p}_i^{1-R} d_i + \sum_{i=1}^n \bar{Q}_i \bar{p}_i^{1-R} d_i^*]^{\frac{1}{1-R}}, P^* = [\sum_{i=1}^n \bar{Q}_i^* \bar{p}_i^{1-R} d_i + \sum_{i=1}^n \bar{Q}_i^* \bar{p}_i^* \bar{p}_i^{1-R} d_i^*]^{\frac{1}{1-R}} \quad (4)$$

故垄断竞争的北方代表性工业品生产企业的利润函数为:

$$P = p d + \bar{p} \bar{d}^* - \frac{R-1}{R} (d + S \bar{d}^*) - r \quad (5)$$

由 (3)、(4)、(5) 三式和企业利润最大化行为可知,北方代表性工业品在北方和南方的均衡价格分别为: $p = 1, \bar{p}^* = S$ 故北方和南方居民购买 (2) 式所示的工业品组合的价格指数分别为:

$$P = \{ [H + U(1-H)] K^w \}^{\frac{1}{1-R}}, P^* = \{ [UH + (1-H)] K^w \}^{\frac{1}{1-R}} \quad (6)$$

其中, $U = S^{1-R} I(Q)$ 代表两国之间的贸易自由化程度, U 越大代表两国的贸易自由化程度越高。

根据工业品市场的自由进入条件,代表性工业品生产企业利润是零,从而由 (5) 式和南方代表性工业品生产企业类似的利润函数可知,北方和南方均衡的资本回报率分别为:

$$r = \frac{L(1-N)}{RK^w} \left[\frac{E}{H + U(1-H)} + U \frac{E^*}{UH + (1-H)} \right] \quad (7)$$

$$r^* = \frac{L(1-N)}{RK^w} \left[U \frac{E}{H + U(1-H)} + \frac{E^*}{UH + (1-H)} \right] \quad (8)$$

其中,南方和北方的消费总支出分别为:

$$E = (K^w [H + (1-H)r^*] + (L^w + ES^w) s \quad (9)$$

$$E^* = (1 - \theta) K^w [UH + (1-H)r^*] + (1 - \theta) L^w + (1 - E) S^w \bar{s} \quad (10)$$

其中, s 为北方旅游资源的价格, \bar{s} 为南方旅游资源的价格。我们引入三个记号,分别为 L^{trade} 、 L^{move} 和 Q^{move} 。 L^{trade} 代表贸易品部门 (包括农业和工业两个部门) 的劳动力就业量,也就是经济系统的劳动力就业总量扣除旅游服务业劳动力就业量的剩余部分,即 $L^{trade} = L^w - aS^w$ 。为了考察北方旅游资源高度丰裕 ($E \setminus \theta$) 带动旅游服务部门扩张对工业发展的影响,我们引入 L^{move} 来代表北方因旅游资源相对于其他要素更加丰裕而额外吸纳的劳动力数量,即 $L^{move} = (E - \theta) aS^w$; 这与 Corden 与 Neary (1982) 所谓的自然资源部门扩张诱发劳动力向自然资源部门流动的转移效应相对应。由于均衡状态时,南北工资率均为 1, 故引入 Q^{move} 来代表北方旅游资源高度丰裕导致旅游服务部门吸纳的额外劳动力价值占整个经济总收入的比例,即 $Q^{move} = \frac{L^{move}}{GNP + GNP^*} = \frac{L^{move}}{E + E^*} = \frac{L^{move}}{E^w}$ 。由居民的偏好设定可知,整个经济用于贸易品部门和工业部门的支出分别为 $(1-N)E^w$ 和 $L(1-N)E^w$; 同时,由利润最大化的一阶条件可知,南北两国工业企业向资本支付的总回报为 $\frac{L(1-N)E^w}{R}$, 从而南北两国在农业和工业两个部门就业的劳动力总额为: $L^{trade} = (1-N)E^w - \frac{L(1-N)}{R} E^w$, 即有关系式 $E^w = \frac{R}{(1-N)(R-L)} L^{trade}$ 成立; 所以,旅游服务部门吸纳的额外劳动力价值占整个经济总收入的比例 $Q^{move} = (1-N) \frac{R-L}{R} \frac{L^{move}}{L^{trade}}$ 。

三 均衡及稳定性分析

为了研究空间均衡及其稳定性,我们继承新经济地理学的传统假定,即产品市场调整是瞬时完成的,资本的国际流动相对缓慢。同时,国际资本流动遵循如下一个特别的动态系统:

$$\hat{H} = (r - r^*)(1 - H)H \quad (11)$$

这个动态过程源自演化博弈论中的复制动态并被新经济地理学的经典文献所采用 (Fujita et al, 1999, Baldwin et al, 2003)。在直觉上, 当 $r > r^*$ 时, 资本流向北方且与当前的北方份额 H 和南方份额 $1 - H$ 有关。值得一提的是, 虽然我们的稳定性分析是基于上述特别的动态系统, 但 Tabuchi 与 Zeng (2004) 表明在两国模型中, 该动态系统的均衡稳定性分析结论对其他动态系统同样成立。

首先, 我们考察农业部门, 其市场出清条件为:

$$L_A + L_A^* = (1 - L)(1 - N)(E + E^*) \quad (12)$$

南北两国旅游服务业的劳动力市场出清条件分别为:

$$L_T = \frac{aN}{a + s} [CE + (1 - C)E^*], \quad L_T^* = \frac{aN}{a + s^*} [(1 - C)E + CE^*] \quad (13)$$

旅游资源的市場出清条件分别为:
$$E^S = \frac{N}{a + s} [CE + (1 - C)E^*] \quad (14)$$

$$(1 - E)S^w = \frac{N}{a + s^*} [(1 - C)E + CE^*] \quad (15)$$

由 (7)、(8)、(9)、(10)、(14) 和 (15) 式构成的方程组可以解出, 南北两国均衡的支出水平 (E 和 E^*)、资本回报率 (r 和 r^*) 和旅游资源价格 (s 和 s^*) 分别为:

$$E = \frac{RL^{\text{trade}} [(1 + N(1 - C)) - Q^{\text{move}}]}{R - L (1 - N)[1 + (1 - 2C)N]} \quad (16)$$

$$E^* = \frac{RL^{\text{trade}} [1 - (1 + N(1 - C)) + Q^{\text{move}}]}{R - L (1 - N)[1 + (1 - 2C)N]} \quad (17)$$

$$s = \frac{RL^{\text{trade}} [1 - C - (1 - N)((1 - 2C)N - Q^{\text{move}})]}{S^w E(1 - N)(R - L)[1 + (1 - 2C)N]} - \frac{a}{E} \quad (18)$$

$$s^* = \frac{RL^{\text{trade}} [1 - C - (1 - N)((1 - 2C)N + Q^{\text{move}})]}{S^w (1 - E)(1 - N)(R - L)[1 + (1 - 2C)N]} - \frac{a(1 - C)}{1 - E} \quad (19)$$

$$r = \frac{IL^{\text{trade}}}{(R - L)[1 + (1 - 2C)N]K^w} \left\{ \frac{(1 + N(1 - C))}{H + U(1 - H)} + U \frac{1 - (1 + N(1 - C))}{(1 - H) + UH} - \frac{(1 - H)(1 - \hat{H})Q^{\text{move}}}{(1 - H + UH)[H + U(1 - H)]} \right\} \quad (20)$$

$$r^* = \frac{IL^{\text{trade}}}{(R - L)[1 + (1 - 2C)N]K^w} \left\{ \frac{1 - (1 + N(1 - C))}{(1 - H) + UH} + U \frac{(1 + N(1 - C))}{H + U(1 - H)} + \frac{H(1 - \hat{H})Q^{\text{move}}}{(1 - H + UH)[H + U(1 - H)]} \right\} \quad (21)$$

我们考虑内点均衡 $r = r^*$, $H \in (0, 1)$, 记内点均衡时北方雇用的资本份额为 \hat{H} , 故有命题 1。

命题 1 当内点均衡时, 北方雇用的资本份额满足: $\hat{H} = H + H$ (22)

其中, $H = \frac{(1 + N(1 - C)) - Q^{\text{move}}}{(1 - N)[1 + (1 - 2C)N]}$, $H = -\frac{1 + U}{1 - U} \frac{Q^{\text{move}}}{1 + (1 - 2C)N}$, 同时, 内点均衡稳定。

具体的证明为: 结合内点均衡条件 $r = r^*$ 及 (20)、(21) 两式, 可得 (22) 式所示的内点均衡时北方雇用的资本份额。北方和南方资本回报率之差关于北方资本雇用比例 H 在均衡点 \hat{H} 处的导数为负, 即:

$$\frac{d(r - r^*)}{dH} \Big|_{H = \hat{H}} = - \frac{L(1 - U)^2 L^{\text{trade}}}{(R - L)(1 - H + UH)[H + U(1 - H)]K^w} \Big|_{H = \hat{H}} < 0 \quad (23)$$

故内点均衡是稳定的。将 (22) 式代入 (20) 式或 (21) 式, 可得两国均衡的资本回报率 $r = r^* = \frac{U^{\text{trade}}}{(R-L)K^w}$ 。从 (22) 式可知, 北方国家均衡的企业数比例 H 由 H_1 和 H_2 两项构成, 且 H_1 与北方初始的旅游资源比例 E 无关。通过进一步地分析, 我们可以发现:

11 若 $E = 1$ (即南北两国不存在 $H-O$ 意义上的要素禀赋比较优势。此时, 北方均衡的企业数比例 $H = H_1$ 且由两部分构成: 第一部分为北方国家初始状态拥有的资本或劳动力比例 $\frac{N}{N+1}$ 。第二部分为母国市场效应 逆母国市场效应。(1) 当工业品贸易成本较低或人们对贸易品的支出份额较高使 $U > \bar{U} = \frac{N(1-C)}{1-CN}$ 满足时, 该部分为正; 此时, 作为大国的北方拥有比初始资本比例更高的工业企业数比例, 即出现 Krugman (1980) 所谓的母国市场效应 (Home Market Effect HME)。(2) 当工业品贸易成本较高或人们对贸易品的支出份额较低使 $U < \bar{U}$ 满足时, 该部分为负; 此时, 作为大国的北方拥有的工业企业数比例低于初始资本比例, 即出现 Yu (2005) 所谓的逆母国市场效应 (reverse HME)。这两种情况出现的原因在于, 在给定工业品贸易成本的情况下, 人们对贸易品的支出份额较高意味着对旅游服务这一非贸易品的支出份额较低, 从而大国居民对小国旅游服务业的消费与小国居民对大国旅游服务业的消费之差额占整个世界 GDP 的比率不高; 也就是说, 大国居民消费小国生产的旅游服务品对小国带来的收入扩大效应不足以使小国吸引足够多的工业企业, 工业企业选址于大国可以获得因巨大的市场接入效应而带来的较高赢利水平; 如果相反, 则意味着小国可以依托大国居民对其旅游服务业消费带来的巨额收入增长吸引足够多的工业企业选址于此, 从而出现小国吸引超过其初始资本比例的工业企业数目。

21 若 $E > 1$ (即北方不仅是大国, 而且其旅游资源比南方更丰裕。不难发现, 北方均衡企业数比例 H 的第一项 H_1 同前所述, 其第二项 H_2 与北方初始旅游资源比例 E 有关, 此时有 $H < Q$ 这就是旅游资源丰裕带来的转移效应。换言之, 北方旅游资源丰裕不利于北方工业的发展。这是因为, 北方拥有的旅游资源比例 E 越高, 旅游服务业发展吸引劳动力从贸易部门 (农业和工业) 向非贸易部门 (旅游服务业) 转移的数量越多。

综上所述, 在 $E = 1$ 的一般情形下, 要观察到 HME, 即 $H^* > 1$, 则必须有下述关系式成立:

$$\frac{U - N + NC(1-U)}{1+U} (2 - 1) - Q^{\text{move}} > 0 \tag{24}$$

显然, (24) 式的左边关于 U 和 C 是递增的, 也就是说工业品贸易成本越低和 (或) 居民越偏好消费本国的旅游服务品, 则越有利于观察到 HME; 同时, (24) 式的左边关于 E 是递减的 (因为 $Q^{\text{move}} = (1-N) \frac{R-L}{R} \frac{(E-1)aS^w}{L^w - aS^w}$), 从而北方旅游资源越丰裕, 带来的资源转移效应越大, 越难观察到 HME。这就是说, 如果人们对本国旅游服务品的偏好很强 (C 较大), 那么大国拥有更丰裕的旅游资源对工业发展带来的收入效应会超过转移效应 (挤出效应), 从而促进该国工业的发展, 这时 / 资源诅咒 0 不会发生。

四 福利分析

为简化分析, 我们消除南北两国之间的要素禀赋比较优势, 即假设 $E = 1$ 。记北方和南方居民的人均收入分别为 y 和 y^* , 则北方和南方居民的间接效用函数分别为:

$$V = \frac{y}{CPI} \quad V^* = \frac{y^*}{CPI^*} \tag{25}$$

其中, $CP I = \left(\frac{Pr}{CN}\right)^{CN} \left[\frac{Pr}{(1-C)N}\right]^{(1-C)N} \left[\frac{P}{L(1-N)}\right]^{L(1-N)} \left[\frac{1}{(1-L)(1-N)}\right]^{(1-L)(1-N)}$, $CP I^* = \left[\frac{Pr}{(1-C)N}\right]^{(1-C)N} \left(\frac{Pr}{CN}\right)^{CN} \left[\frac{P^*}{L(1-N)}\right]^{L(1-N)} \left[\frac{1}{(1-L)(1-N)}\right]^{(1-L)(1-N)}$ 分别为北方和南方居民面临的消费者价格指数。

由于劳动力在两国间不流动, 从而两国居民的福利不一定相等。故我们关注的问题是, 谁能获得相对较高的福利水平及其需要满足的条件。将 $E = ($ 代入 (18)、(19) 两式, 可得:

$$s^* - s = \frac{RN(1-C)(2(1-L)^{trade}}{(R-L)((1-)(1-N)[1+N(1-2C)]S^w} > 0 \quad (26)$$

(26) 式意味着当两国要素禀赋相同时, 旅游服务业在小国比大国面临着更高的需求使小国旅游资源价格高于大国旅游资源价格。进一步地, 从 (16)、(17) 两式可得南北居民的人均收入为:

$$\begin{cases} y = \frac{E}{L^w} = \frac{RL^{trade}}{R-L} \frac{(1+N(1-C))}{(1-N)[1+(1-2C)N]} \frac{1}{L^w} \\ y^* = \frac{E^*}{(1-())L^w} = \frac{RL^{trade}}{R-L} \frac{1-(1+N(-C))}{(1-N)[1+(1-2C)N]} \frac{1}{(1-())L^w} \end{cases} \quad (27)$$

故北方与南方居民的福利水平之比为:

$$\begin{aligned} \frac{V}{V^*} &= \frac{y}{y^*} \frac{CP I^*}{CP I} \\ &= \left(\frac{1-()}{()}\right)^{(1-N)(1-C)} \left[\frac{(1+N(1-C))}{1-(1+N(-C))}\right]^{\frac{L(1-N)}{(R-L)}} \left\{\frac{(1-2C)(1-(1+N(-C))) + C}{(1-2C)[(1+N(1-))] + C}\right\}^{N(1-2C)} \end{aligned} \quad (28)$$

通过对 (28) 式的分析, 我们可以得到命题 2。

命题 2 (1) 若 $C = 1$, 北方居民总是比南方居民拥有更高的福利水平; (2) 若 $C < 1$, 则存在 $N(N_0)$, 使得当 $N > N_0$ 时, 南方居民将比北方居民拥有更高的福利水平。

证明: 若 $C = 1$, 则 (28) 式为, $\frac{V}{V^*} = \left(\frac{1-()}{()}\right)^{\frac{L(1-N)}{(R-L)}} > 1$; 若 $C < 1$, 根据 $\frac{V}{V^*}$ 的连续性和 $\lim_{N \rightarrow 1} \frac{V}{V^*} = \left(\frac{1-()}{()}\right)^{2(1-C)} < 1$, 可知结论成立。

因此, 当引入旅游服务业后, 如果两国居民都只消费本国的旅游服务品, 那么大国居民的福利水平一定高于小国居民。如果两国居民都消费本国和外国旅游服务品, 那么当人们对旅游服务品的偏好很强 (即 N 充分大) 时, 小国居民将比大国居民过得更快乐。这可以解释为什么旅游服务业在卢森堡、新加坡等国家的发展使其居民获得了较高的福利水平。

五 结论

本文通过建立两国三部门三要素模型, 探讨了大国开放经济背景下旅游服务业扩张对工业发展的影响及其福利含义。研究发现, 旅游服务业发展会带来收入效应和转移效应, 收入效应对工业发展具有正向促进作用, 而资源转移效应对工业发展具有负向挤出作用。因此, 旅游服务业发展究竟是促工业化还是去工业化与外生参数有关。一方面, 国际贸易自由化程度的提高和居民对本国旅游服务品的较强偏好带来的收入效应有利于大国集聚比初始资本比例更高的工业企业; 另一方面, 丰裕的旅游资源对工业产

生的资源转移效应不利于该国工业的发展。因此,当工业品贸易成本足够低和居民对本国旅游服务品偏好足够强时,大国拥有丰裕的旅游资源带来的收入效应会超过资源转移效应,使大国吸引超过其初始资本比例的工业企业,从而逃脱/资源诅咒陷阱。

进一步的福利分析发现,如果所有国家居民都只消费本国旅游服务品,那么大国居民比小国居民拥有更高的福利水平;但如果两国居民都消费本国和外国旅游服务品,那么随着人们对旅游服务品支出比例的提高,小国居民的相对福利水平会不断提高,以至于超过大国居民的福利水平。

参考文献:

国家旅游局 (2007): 5中国旅游统计年鉴6,北京:中国旅游出版社。

Balguer L. and Cantavela- Jorda M. / Tourism as a Long- run Economic Growth Factor: The Spanish Case 0 Applied Economics 2002 34 pp. 977- 884

Balkin, R.; Forslid, R.; Martin, P.; Ottaviano G. and Robert- Nicoletti, F. Economic Geography and Public Policy.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3

Chao C - C.; Hazari B.R.; Laffargue, J - P.; Sgro P. M. and Yu E. S.H. / Tourism, Dutch Disease and Welfare in an Open Dynamic Economy 0 Japanese Economic Review, 2006, 57(4), pp 501- 515

Copeland B. R. / Tourism, Welfare and de- industrialization in a Small Open Economy 0 Economica, 1991, 58 pp 515- 529.

Corden W. and Neary J.P. / Booming Sector and De- industrialization in a Small Open Economy 0 Economic Journal, 1982, 92, pp 825 - 848.

Dixit A. and Stiglitz J. / Monopolistic Competition and Optimum Product Diversity 0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77, 67, pp. 297- 308

Drisakis N. / Tourism as a Long- run Economic Growth Factor: an Empirical Investigation for Greece using Causality Analysis 0 Tourism Economics 2004 10(3), pp. 305- 316

Dubarry R. / Tourism and Economic Growth The Case of Mauritius 0 Tourism Economics 2004 10(4), pp 389- 401

Fujita M.; Krugman, P. and Venables A. The Spatial Economy Cities, Regions and International Trade Cambridge MA: MIT Press 1999.

Gelb A. Windfall Gains: Blessing or Curse?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8.

Hazari B.R.; Nowak, J.J.; Sahli M. and Zdravovskij D. / Tourism and Regional Immigration 0 Pacific Economic Review, 2003, 8 pp 269- 278

Kim, H. J.; Chen M. - H. and Jang S. / Tourism Expansion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The Case of Taiwan 0 Tourism Management 2006, 27, pp. 925- 933.

Krugman P. / Scale Economies, Product Differentiation, and the Pattern of Trade 0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80 70(5), pp 950- 959

Nowak J - J.; Sahli M. and Sgro P. M. / Tourism, Trade and Domestic Welfare 0 Pacific Economic Review, 2003 8(3), pp 245- 258

Nowak J.J. and Sahli M. / Coastal Tourism and Dutch Disease' in a Small Island Economy 0 Tourism Economics 2007, 13(1), pp 49- 65

Oh C. O. / The Contribution of Tourism Development to Economic Growth in the Korean Economy 0 Tourism Management 2005, 26, pp 39 - 44

Samuelson, P. A. / The Transfer Problem and Transport Costs: The Terms of Trade when Impediments are Absent 0 Economic Journal, 1952 62 pp. 278- 304

Tabuchi T. and Zeng D. Z. / Stability of Spatial Equilibrium. 0 Journal of Regional Science, 2004 44, pp 641- 660

Yu Z. / Trade, Market Size and Industrial Structure: Revisiting the Home Market Effect 0 Canadian Journal of Economics 2005 38 pp 255- 272.

(截稿: 2008年 12月 责任编辑: 宋志刚)